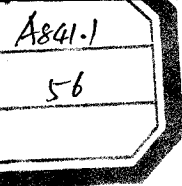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学 习 问 答

(一)

北京人民出版社



说 明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问答》，是本市一些单位的工农兵理论骨干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共同编写的。为了及时配合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准备先以活页形式陆续出版。由于编写仓促，一定会有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七年四月

目 录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2618/04

梁漱溟“九天九地”谬论的反动实质是什

么? (1)

梁漱溟在历史上是怎样一贯反共反人民的? (5)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什么货色? (8)

怎样认识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

犯? (12)

《驳“舆论一律”》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我们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怎么回

事? (15)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的反动实质是什

么? (19)

如何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

认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特点和规

律? (23)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梁漱溟“九天九地”谬论的反动实质是什么？

一九五三年，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已告结束，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正式公布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要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唯一的基础。这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的资产阶级，这时又在总路线问题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梁漱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梁漱溟在这个时候，抛出了“九天九地”的谬论。这个谬论说什么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进城后，只注意发展工业，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而“忘掉了”农村，致使“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农村工作“落后”，“农民太苦”；对农民来说，共产党“靠不住”，还不如资本家的组织工商联“可靠”；为了“改善”农民的状况，必须遵照孔老二的“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则，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梁漱溟的这一谬论是作为一条路线提出来的，公然要求党和国家必须贯彻执行。他妄图用这条路线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对抗，以改变我国革命的方向，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扼杀在摇篮里。

一、梁漱溟的路线是一条同党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和破坏工农联盟的路线。梁漱溟是个阴险狡猾的人。在“九天九地”的谬论中，他把自己装扮成“农民代表”，打出“为民请命”的幌子，利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不可能立即消灭的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差别，大肆挑拨党和工人同农民的关系。梁漱溟的攻击矛头是对着我们党的。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党对农民的领导权夺到以他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手中，以破坏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然而，梁漱溟的阴谋是永远也不会得逞的。因为他用来挑拨党和工人同农民的关系的种种指责，没有那一条有事实根据，都是梁漱溟利令智昏、凭空捏造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三年短短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近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七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的生产资料；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党又不失时机地领导农民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有力地限制了农民的两极分化，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彻底制止了国民党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开展了城乡交流，合理地调整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比价，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价已

开始缩小（例如广西灌阳，一九四八年未解放时买一斤盐要二十三斤谷子，一九五三年只要三斤五两谷子，后来更加缩小了）；国家的信贷部门发放了大量的农贷（一九五〇年国家全年放出的农贷是二亿一千二百四十一万元，一九五一年是三亿九千九百五十四万元，一九五二年是九亿六千六百一十八万元，一九五三年是十亿零五千一百四十一万元），国家的工业部门积极地支援了农村（例如，一九五二年仅关内通过合作社供给农民的各种肥料就有二百五十三万吨）。这一切使广大农民的生活已开始逐步提高（例如，在老解放区，原来的贫农中已有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以上上升到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在新解放区，原来的贫农中也有一半以上上升到中农的生活水平），有些农民的生活比工人还高一些。所有这些，都是铁的事实。这些事实戳穿了梁漱溟的“九天九地”谬论完全不是什么“诤言”，而是一株破坏工农联盟的大毒草。

二、梁漱溟的路线是一条破坏国家工业化的路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差别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拿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来说，虽然有些农民的收入比工人的工资还高一些，但总的说来，工人的工资一般比农民的收入高一些。这种差别的存在，主要是由这样两个原因造成的：①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②城市工人的生活费用比农民也高得多。在这种条件下，工人的工资比农民的收入高一些是完全必要的，它并不是由于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而造成的。要消灭工农之间这种收入上的差别，就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实现农业机械化，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这些道理是浅显易懂的。然而，自称是“思想家”的梁漱溟，在这个问题上却不顾起码的常识，硬要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可以断定，对广大农民的生活来说，根本不会有什么补助。因为工人拿出的那一部分钱，由几亿农民平均分配，每一个农民能够得到的钱微乎其微。但是，这一拿必然使广大工人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陷于吃不饱的困难境地，因而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这样一来，就会使工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根本无法发展，当然更谈不上实现国家工业化了。解放前，梁漱溟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竟丧心病狂地同帝国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竭力主张“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现在，他又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反对国家工业化，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将新中国重新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

三、梁漱溟的路线是一条破坏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我们已经看到，按照梁漱溟的路线，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必然遭到破坏，国家工业化的事业也必然遭到破坏，这样，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为破坏了工农联盟，就必然使农业合作化遭到破坏；而农业合作化如果遭到破坏，再加上国家工业得不到发展，国营经济领导力量薄弱，这一切就会使国家无法实现对手工业，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结果，必然造成城乡资本主义的大泛滥。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梁漱溟的路线是一条不折

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实行这条路线，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这就是梁漱溟的“九天九地”谬论的反动实质所在，也是梁漱溟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大暴露。对于梁漱溟以及其他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必须予以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梁漱溟在历史上是怎样一贯反共反人民的？

梁漱溟抛出“九天九地”谬论，疯狂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不是偶然的。梁漱溟长期以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道貌岸然的“救世主”，号称“佛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改革运动者”，并且一向标榜自己“爱国”、“公正”、“清白”，欺世盗名，招摇撞骗。毛主席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以锋利的语言，彻底揭穿了他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

梁漱溟，广西桂林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祖辈三代都是吞食民脂民膏的吸血鬼。他早年就醉心于君主立宪运动，反对同盟会的革命势力。一九一六年投靠北洋军阀政府，在司法部供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我国传播，就在这一年，他到北京大学教书，致力于宣扬“孔子释迦”。

一九一九年，我国爆发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促进了马列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梁漱溟对此极端仇视和

恐惧，于一九二一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是一部疯狂反对五四新文化、维护封建旧礼教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著作。他胡说中国问题只是一个“文化失调”问题，否认帝国主义、军阀和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否认中国社会是阶级社会。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梁漱溟从我们党成立的时候起，就跟党处于对抗的地位。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我们党建立了革命联盟，从而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梁漱溟对此深恶痛绝，诬蔑国共合作是国民党“受惑又受制于共产党”，认为这是“十分可怕”的“危机”；而对后来蒋介石的“清共”反动政策，他则拍手叫好，声嘶力竭地叫嚷，不独要清除共产党分子，而且要清除共产党理论，只有这样才“算得认真彻底”。真是反动透顶！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深入农村，武装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伟大的土地革命运动。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斗争，梁漱溟恶毒攻击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实亦与土匪差不多”，甚至把共产党比作“禽兽”。他还先后抛出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两株大毒草，狂叫：“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这另一种“农民运动”，就是梁漱溟一生为之奔走呼号的“乡村建设运动”，它完全是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梁漱溟投靠山东军阀韩复榘，当了伪山东省政府高等政治顾问、山东乡村建设

研究院院长，在邹平、荷泽等地大搞“乡村建设”的“实验”，拚命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在这期间，他还去日本“考察”，一回来就厚颜无耻地宣扬“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主义滥调，妄图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梁漱溟就是这样以反革命的“乡村建设理论”，来配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

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和蒋介石一唱一和，大肆散布失败论调，鼓吹投降卖国，明目张胆地叫嚣：“‘打倒帝国主义’，只可作为一口号来倡说”，“武力反抗，既属不智，亦不正确，亦不可能。乃至以经济不合作来反抗他，亦难作得到”，充分露出一副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策划和援助下，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消灭共产党，他狡猾地玩弄“和谈”阴谋，欺骗人民。这时，梁漱溟居然以“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面目出现，参与“和谈”，实际上是完全站在美蒋一边，反对共产党。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曾两次去延安，冒充“调人”，要我党放弃武装斗争。当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毛主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时刻，梁漱溟又跳出来，恶狠狠地叫喊“不要再打”了，攻击我党“滥用武力”，并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妄图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这期间，梁漱溟为了适应国民党反动派反共灭共的政治需要，仍继续搞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他在南京和CC特务头子陈立夫合作，在四川和国民党政学系头目张群合作，和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结成密友。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对中国人民革

命的胜利，怀有刻骨仇恨，幻想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天，他写成了最后一部反动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内容反动自不必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上，还特别标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双十节漱溟自记”。由此看出他对已经完蛋的蒋家王朝是何等的忠诚，他的反动立场是何等的顽固。随后，他表面上伪称自己思想上有了“转变”，实则改换手法，变本加厉地向党进攻。一九五二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梁漱溟出自他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疯狂反对总路线，造谣惑众地说什么，共产党过去依靠农民，进城以后就把农民抛弃了，现在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俨然以“农民代表”自居，明目张胆地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梁漱溟的反革命言行，博得了蒋介石集团的喝采，说他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让他当政协委员呢？就因为他在一部分人中还有欺骗作用，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国革命的重大时期，梁漱溟始终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维护一切腐朽黑暗的反动统治。毛主席指出：“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但剥去伪装，露出真相，原来他的历史是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的历史。梁漱溟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伪君子，是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什么货色？

梁漱溟在他反共反人民的历史上，大搞所谓乡村建设运

动，他自己也以乡村建设理论家自居。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在一九二八年形成的。接着，他便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了开办乡治讲习所的建议，依靠反动政府和封建军阀的支持，在河南、山东等地大搞“乡村建设”的实验。梁漱溟如此热衷于“乡村建设”，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反动的政治目的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极为恐惧和仇视，为了消除这一心腹之患，疯狂地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梁漱溟出于地主阶级的反动本性，急忙跳出来杀气腾腾地狂叫：“共产党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去剿是不行的”，“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来替代才可以”，只有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才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有此运动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以没有”。所以，他大搞所谓“乡村建设”，配合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来进行文化“围剿”，力图消灭共产党。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究竟是什么货色？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的反动本质，指出：它“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只要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稍加剖析，这一反动本质就暴露无遗了。

请看，梁漱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所竭力鼓吹的反动谬论：

一、他胡说什么“中国社会特殊”，“只有一行一行的职

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乡村是一整个的”，而没有地主和农民的区别，因此，中国没有发生“革命的决定原因”，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都不是革命的对象，妄图从根本上取消革命，使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长治久安。

二、他宣扬封建主义剥削制度“顶多不过是一种阶级剥削，阶级剥削为各阶级社会通有的现象，历史所必经过，即在被剥削一面亦不是绝对的受害”，因此，对于这种剥削制度决不能推翻，“欲推翻者无不失败”，妄图使封建土地私有制永世长存。

三、他狂叫，为了防止“土匪赤匪”的“骚扰”，必须建立“乡村自卫”的地主武装，以巩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统治。

四、他荒谬地提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样，恰好给中国农业留下一点活动余地”，不仅使地主阶级能够照旧地剥削农民，而且可以防止“发生共产革命”，所以，“帝国主义不是真正革命对象”。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常庆幸”，高呼“谢天谢地”，哀求：“请你还是侵略我罢！”

梁漱溟就是按照他的这一套反动理论，身体力行地大搞所谓“乡村建设”运动。为此，他精心设计了一个“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三位一体的“乡村组织”。这个“乡村组织”包括：①乡长；②乡农学校；③乡公所；④乡民会议。前两项属于文化运动系统，后两项属于政府系统。梁漱溟提出这两个“系统”的区分，是妄图用文化教育的外衣来掩盖它为地主阶级政权忠实服务的反动实质。这种虚伪性和反动性，充分体现在作为整个“乡村组织”

的核心“乡农学校”上面。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乡农学校”即是“社会教育民众训练机关”，又是“下级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借此而执行”。因此，它并不是什么学校，而直接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第二，“乡农学校”由校董会、校长、教员和乡民组成。校董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关，校长由乡长兼任，校长和校董会完全被地主豪绅所把持。第三，“乡农学校”的课程，是向农民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国民党“党义”和反动政府的现行法令，要他们“不以享福为念，而惧自己所作所为有失于理”，做到如“古人所说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妄图让农民永远安于吃糠咽菜，当牛做马，由地主阶级任意宰割。第四，“乡农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训练和建立地主武装，以消灭共产党，镇压农民革命。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进行的所谓“经济建设”，其实质就是要农民同地主阶级密切“合作”，成为地主阶级驯服的“经济战士”，给地主阶级“尽力于复兴农业生产”，“以农业引发工业”，提供更多的地租，生产更多的手工业品，以便更好地满足地主阶级穷奢极欲的需要，一句话，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农业和手工业建设，是货真价实的地主阶级的“经济建设”。应当强调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而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二者狼狈为奸，所以，梁漱溟的“经济建设”既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同时，也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他的所谓“合作社”、“恢复农业生产力”、“增进”“农村购买力”以及“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主义闹

言，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掠夺廉价原料，倾销过剩商品，加强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使中国更加殖民地化的需要，是彻头彻尾的乡村破坏和国家灭亡。

综上所述，梁漱溟的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来全面加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对农民的统治和剥削，因而遭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坚决反对。

怎样认识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

历来的反动派杀人都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毛主席指出：“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在历史上一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舞文弄墨，著书立说，从事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继承孔老二的衣钵，极力鼓吹封建伦理道德，用吃人的旧礼教毒害人民；他为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拍手叫好，给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出谋献策，配合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围剿”，大搞文化“围剿”；他无耻美化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辩护，妄图变我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要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甚至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的时候，他还竭力反对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妄图保护蒋家王朝半壁河山，使它得到喘息机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新把中国人民抛入血泊之中；直到解放后，他仍坚持反动立场，反对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梁漱溟的笔杆子是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的。他用笔杆子直接与蒋介石的枪杆子配合在一起，血腥屠杀中国人

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赤裸裸地血腥屠杀和镇压人民，是比较容易被人们认清，激起人民的愤怒和反抗。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他俨然以“救世主”自居，摇动笔杆，制造种种花言巧语，搞乱人们的思想，腐蚀人们的灵魂，解除人们的精神武装，扼杀人们的革命意志，要人们恭恭敬敬地服从反动派的统治，俯首贴耳地任凭反动派的宰割。他能够在一个时期蒙蔽和欺骗一些人。所以，“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能够起到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仅就其用笔杆子杀人来说，也是一伙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他们控制了舆论阵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打着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幌子，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提出所谓“揪现代的儒”，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他们破坏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炮制“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把罪恶矛头直接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的老干部；他们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杀气腾腾地叫嚣要“揪一层人”，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大开“钢铁工厂”、“帽子工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颠倒黑白，制造混乱，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横行霸道，倒行逆施。他们用笔杆子制造种种反革命舆论，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复辟资本主义，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把全国人民再推入血海之中。

在用笔杆子杀人上，“四人帮”也有与梁漱溟不同的地方。首先，“四人帮”窃取了党和国家的宣传大权。他们不仅自己动笔炮制黑文，而且还有“梁效”、“罗思鼎”等御用写作班子，还掌握了报纸刊物、出版发行、电台广播等各种舆论工具，严密控制了舆论阵地。他们利用舆论猖狂向党进攻，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这是梁漱溟不能与之相比的。同时，“四人帮”欺世盗名，给自己戴上一顶又一顶桂冠，披上一件又一件外衣，诸如“马列主义理论家”，“解释毛主席著作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功臣”，以及“战友”、“学生”等等，不一而足。他们是一批我党历史上少见的大政治骗子。在这一方面梁漱溟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所以，“四人帮”比起梁漱溟来，是更加阴险狡猾、更加凶狠毒辣的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四人帮”利用舆论阵地大搞篡党夺权活动，又从反面告诉我们革命舆论的重要性和反革命舆论的巨大危害。我们决不要小看了舆论的作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重新夺回了被他们把持的舆论阵地。我们一定要大造革命舆论，发挥革命舆论的巨大威力，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批深批透，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而努力。